

Franc  
Dollar

12 ぱん円  
Pound

Pound

世界金融风云录

[美] 保罗·厄尔德曼



# 世界金融风云录

[加拿大] 保罗·厄尔德曼 著  
章挺权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Paul E. Erdman  
THE BILLION DOLLAR SURE THING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73

世界金融风云录

(加拿大) 保罗·厄尔德曼 著  
章挺权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7.375 插页 2 字数 180,000  
1987 年 2 月第 1 版 198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4,000 册

书号：10188·693 定价：1.40 元

## 简介

这部小说是一个关于涉及几十亿美元的惊人故事，发生在国际金融领域。在控制黄金、美元和卢布前途的权力斗争中，瑞士银行家与近东的投机商相互较量；俄国和美国直接交锋。

美国进行大刀阔斧的货币改革的一份秘密计划泄漏给瑞士的一个主要银行家，把世界带到了历史上最大的金融爆炸的边缘。在这一复杂的国际戏剧中出现的主要人物有几十个，其中包括美国财政部长，欧洲最有名的撬保险柜的惯窃，瑞士、美国、英国和黎巴嫩等国世界上主要银行家，身材高大、容貌美丽的法国女郎，聪明而有权力的苏联经济学家，参加黑手党的纽约货币经营者。故事的主要背景是在瑞士，但是在华盛顿、伦敦、巴黎、莫斯科和贝鲁特到处都有这些人物的活动踪迹。

本书是由金融专家写的第一部涉及世界货币市场上勾心斗角活动的小说。它对国际金融的各种活动提供了如实描绘，对外贸外事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都有很大的认识作用，值得一读。它又是一部精采的悬念小说——情节复杂紧张，扣人心弦，书中的人物栩栩如生，使读者看后久久不能忘怀。

小说作者保罗·厄尔德曼于一九三二年生于加拿大，在美国长大成人。他在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获硕士学位，在瑞士巴塞尔大学获博士学位。他曾经作为经济学家在欧洲煤钢共同体任职，担任过美国斯坦福研究所的欧洲代表。保罗·厄尔德曼在四十岁以前曾任由他创办的巴塞尔联合加利福尼亚银行

总裁，这家银行后来成为瑞士发展最快的金融机构。这一国际银行的兴衰曾经在许多著作中作过广泛的描述。厄尔德曼先生在经济学方面发表过许多文章和两本书，其中一本是用德文发表的。他由于巴塞尔联合加利福尼亚银行的倒闭而被拘留了十个月，在狱中开始从事创作，写成此书。这是他的第一本小说，出版后畅销一时，被译成十几种文字。

——原出版者

## 开 场 白

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一黄昏，刚过七点。时值秋天，整个欧洲天气反常，而且还在持续。教堂附近的小公园里，树上还残存着几片枯叶。但是，黑森林<sup>①</sup>山峦起伏，笼罩在地平线上，从山岭刮起的秋风不时掠过莱茵河的水面，使树上残留的黄叶沙沙作响。

巴塞尔教堂<sup>②</sup>，在欧洲最著名的教堂中排不上号。在一五二九年席卷欧洲的宗教改革的风暴中，教堂的内部，甚至包括彩色玻璃窗，全被洗劫一空。但是，教堂的双塔，古建筑物的红石门面却成为巴塞尔的象征。自中世纪以来，这座城市一直是莱茵河上游领域地区日耳曼民族的贸易和文化中心。今天，这些民族居住在三个不同的国家——瑞士、德国和法国。巴塞尔在一四三一年宗教会议<sup>③</sup>期间是基督教的中心，后来成为鹿特丹伊拉斯莫斯<sup>④</sup>、汉斯·霍尔本<sup>⑤</sup>、尼采<sup>⑥</sup>等知名人士的云

---

① 黑森林，德国南部山脉。（本书之注释均为译者注。）

② 巴塞尔位于瑞士、法国、西德交界处的莱茵河岸。

③ 马丁五世在一四三一年去世前几周召开的一次宗教会议。

④ 伊拉斯莫斯(Erasmus 1466—1536)，荷兰文艺复兴运动领导人之一。

⑤ 霍尔本(Hans Holbein 1456—1542)，德国画家。

⑥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德国哲学家。

集之地，但现在已变得乡里乡气。事实上，这个城市的最后一个伟人卡尔·巴思<sup>①</sup>曾经宣称，他的同胞们快要变成欧洲的乡下白痴了。(Sic transit gloria Basiliensis)<sup>②</sup>

这些思想，是不可能在树底下坐着的那个人的脑海中出现的。萨米·比肖特是一个撬保险箱的惯窃。不一定所有惯窃都不思考。他们也有思考的时候，包括萨米。但是，不是在工作时间内。

萨米·比肖特，二十七岁。他的盗窃活动有一百三十七次是成功的，有两次相当不成功。不幸的是，他的两次失败使他不得不歇手了很长时间，也不得不重新变换手法。他开保险箱的手段在全欧洲遐迩闻名，鉴定他留下的错综复杂的钻孔花样，象鉴定十个清楚的指印一样容易。意志力稍弱的人也许会绝望。但是萨米坚韧不拔，终于搞出了一种新方法。这种发明十分精巧，如果他从事于更能使人接受的行业，一定会得到人们的承认，甚至赞扬。

塔钟刚打七点一刻，萨米站了起来。从树影下出现的并不是人们所期待的剃平头的技师，而是一个面颊丰满、蓄留长发的人，带着现代抒情诗人的标准装备。萨米带着电吉他、扩音器和喇叭，穿过教堂前的广场，隐没在狭窄的里特格斯街里。街道左边第五幢房子前面有一个小花园，周围用铁格子篱笆围着，萨米停了下来。街上空无一人。正是晚餐时间。

萨米猝然象梭标似地沿里特格斯街飞奔过去。街的另一头是陡峭的石阶，往下伸到莱茵河岸。入夜，河畔成为情侣们最喜欢漫步的地方。可是，现在为时尚早。仅仅几秒钟，萨米拿着行李包翻过了格子篱笆，跳进花园，迅速拿掉一块门玻璃，开了锁，走进空无一人的房子。他找到墙上的保险柜，用了七分钟。

---

① 卡尔·巴思(Karl Barth 1886—1968)，瑞士神学家。

② 意即“巴塞尔的光荣——去不复返”。

他把吉他盒放在一边，打开扩音器，把线接上。接着，他解开两根电线，一根连接喇叭和扩音器，另一根通常是连接扩音器和电吉他。但是，萨米在电线的一端用了一种很奇特的附件，绑在保险柜的号码盘上。他开足扩音器，机器发出了嗡嗡声，表明所有系统工作正常。

萨米耐心地开始转号码盘。慢慢地，慢慢地，“砰”的一声，第一个锁栓打开了，从喇叭里传出的声音洪亮而清脆。现在转到另一个方向。

“砰”。第二个锁栓也打开了。

号码盘在几乎是十全十美的高音C调声中泄露了自己的秘密。萨米每次使用自己的发明，不禁自鸣得意起来。绝对可靠。

保险柜的门马上打开了。萨米用了不到三十秒钟的时间就找到了想找的东西，一个带红皮封面的卷宗。

五分钟以后，萨米在城内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全然不知道，他刚刚完成一项使命，这项使命将要在全球引起一场本世纪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不是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就是给私人金融界发大财创造有史以来最好的机会。或者兼而有之。

想一想：要是肯尼迪爸爸<sup>①</sup>、伯纳德·巴鲁克<sup>②</sup>，甚至卡尔·马克思遇到这种情况会有什么办法！而萨米为这天晚上的劳动将要得到一万瑞士法郎的报酬。

啊，要么去做爱尔兰人，要么去做犹太人。

---

① 肯尼迪爸爸，即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父亲约瑟夫·肯尼迪（1888—1969），美国金融家兼外交家。

② 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 1870—1965），美国企业家兼政治家。

# 1

美国总统并没有因出身上的这类缺点而受到损害。他宣称自己既有爱尔兰人的血统，又有犹太人的血统，其论点虽然从未得到证明，却足以使纽约州的选民经常支持他的党。怀疑派指出，此人既不富有，也不经常酒醉。他们认为，他的密友、财政部长亨利·克罗斯比的举止与祖先们更为一致；他从来不拒绝喝酒，他在担任公职之前是俄亥俄州历史上创业最艰苦，因此也是事业最成功的金融家。已经证明的是，这两人是多年来华盛顿所见到的强有力的一对政治老手。亨利·克罗斯比的丰富的想象力，由于受到总统冷静的判断力的锻炼，被人们认为是本届政府制定大多数成功的政策的源泉。

他们与萨米·比肖特有什么联系？当然没有。唯一的例外就是，克罗斯比和总统之间的会晤导致了那个不吉利的红封皮卷宗的产生。事情发生在九月二十九日。那天上午，克罗斯比闯进了总统办公室，进行通常的十点钟会晤，单方面地取消了一切问候的礼节，惊喊道：“罗马那些混蛋要全力以赴地整我们。上帝！这一回，我看他们是想做了坏事而不被人发觉。”

“亨利，”总统紧接着问，“坐下，慢慢说。我们跟意大利人会发生什么问题把你弄成这副样子？”

“意大利人，去他的，”克罗斯比回答说。“是德国人，日本

人，当然还有那些死不要脸的法国人。”

总统竖起了双眉，但是没有显出过分惊恐的样子。因为他知道，克罗斯比对大多数外国人都有成见，就法国的文化而论，他对大洋彼岸的文化是绝对不欣赏的。熟知内幕的人知道，这件事的起因是一九五七年秋天在旧金山举行的一次招待来访的戴高乐将军的宴会。中西部地区的银行家克罗斯比，是西部地区政界邀请的客人之一。人们喜欢他是因为他有钱，如果不是因为他的举止的话。没有人放弃这个机会，他在正式宴会前的鸡尾酒会中闯进正在和这位伟人说话的人群中间，向他询问他称之为“丧失元气的法国法郎”的前途。

将军先是用最冰冷的目光回敬他，继之对身边的侍卫说：“Qui a fait entrer ce cochon?”

接着他转过身去，走到客厅的另一边。谈话中间突然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寂静，首先被受惊的克罗斯比的问话所打破：“他说什么？”

一位来自阿善顿的贵妇人显然感到对科隆贝双教堂<sup>①</sup>在精神上的关系比对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更为密切，她权充翻译：“将军先生问，”她说，“‘是谁让那只猪猡进来的？’”

此后，克罗斯比对法国的看法不再那么十分客观了。这在华盛顿是众所周知的。总统显然想到了这一点，于是说：“亨利，肯定你的反应过火了。不过，到底是对什么事，我还堕在五里雾里哪。”

克罗斯比已经坐下，似乎已经重新控制了自己的感情。他回答说：“总统先生，你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周正在罗马开年会。嗯，我们的一些所谓朋友已经在会上决定联合起来对付美元。他们打算给我们造成一个既成事实。”

现在，总统的脸上出现了愁云。货币问题和美元在国际上的脆弱地位，自从他上任以来，一直使他十分苦恼。一九七一

---

① 巴黎郊区小镇，戴高乐逝世后葬于此。

年黄金和美元脱钩，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关系重大。而在这以前，世界的货币制度一直是行之有效的。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时制定的章程，每一个国家把本国的货币——马克、日元、法郎、比塞塔——与美元挂钩。因此，一瑞士法郎曾经“值”二十三美分，一德国马克大约相当于二十八美分，等等。大家一致同意，美元是衡量各国货币的自然尺度。理由之一，美元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单位。理由之二，美元是正式地直接地与价值的交换和储存的最古老的媒介——黄金相联系的唯一通货。法律规定，自从一九三四年以来，一美元相当于三十五分之一盎司黄金。美国曾经向全世界宣布，任何国家要用黄金兑换美元，或者用美元兑换黄金，均可按照三十五美元一盎司的汇率进行。

所有这一切安排都是十分合适的，因为这意味着世界上每个人都可指望有统一的价值标准——美元。对于那些令人讨厌的、并不特别渴望新货币的人来说，最终的安慰是，如果不是他们，至少是他们的政府，永远可以获得真正的东西——黄金。

一九七一年八月，这种想法在一些较为奸诈的欧洲人中出现了，他们怀疑美元的地位开始有点不稳定。因此他们决定选择黄金。有比利时人、瑞士人、法国人，甚至还有梵蒂冈人。如同我们所想象的一样，这个时刻对美国来说是相当为难的。当诺克斯堡<sup>①</sup>仅剩下一百亿美元的黄金储备时，它怎么有能力支付六百五十亿美元的欠债呢？

总统的顾问们提出了一个看来是巧妙的解决办法。美国索性宣布：美元不再可以兑换成黄金。事情就那么简单。美国对许多年前以美元支票形式向世界发行的一切借据全部停止支付。

美国政府采取了这一措施以后，进而通知各政府，现在

---

<sup>①</sup> 诺克斯堡(Ford Knox)，美国肯塔基州北部，财政部的金库建于此。

得由他们集体寻找解决世界货币危机的办法了。几个月以后，世界上最强大的十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长专门为这件事在华盛顿开会。但是，就跟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世界上的聪明人都为一只老鼠当催生婆。欧洲国家的政府和日本同意，如果美国把一盎司黄金的价格从三十五美元提高到三十八美元，从而使美元贬值百分之几，他们就把本国货币升值百分之几。结果在史密森博物馆举行了隆重的仪式，签订了一项协定，使全世界松了一口气，一切工作恢复正常。

但是，在美国总统称之为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货币协定的整个华盛顿解决办法中，有一个特别严重的缺陷。这个协定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美元仍然估价过高。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性并没有恢复。以三十八美元一盎司作为汇率，它们之间的可兑性是不可能恢复的。如果已经得到恢复的话，诺克斯堡的一百亿黄金储备将会在几个小时内落入外国政府手里。事实仍然是，世界上还有六百五十亿美元的游资在各地浮动，而且每时每刻还有更多的美元出笼。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都会按三十八美元一盎司的汇率以光速兑换美国的黄金。因为自由市场的黄金价格正在无情地向八十美元一盎司的水平上升。

新的危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九七三年二月，由于对美元进行了又一轮冲击，山姆大叔没有别的抉择，不得不对美元再次贬值，把黄金的官方价格提高到四十二点二二美元一盎司。不过，和以前一样，这也不过是临时的修修补补。美元仍然是不可兑换的，它的估价仍然过高。

因此，抑郁症一直拖延着——一直拖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罗马举行会议。

总统问：“亨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噢，我派副部长去参加这次会议，给他通常的指标。把盖子封紧。什么也别做，什么也别答应。拖着。告诉他们，我们已在着手进行。”

“我想，他照办了。”

“当然。在公开的会议上，每个人对我们的立场都表示同情。他们都认为，时间会治愈创伤。”

“所以？”

“所以在公开的烟幕背后，法国人采取他们惯用的不光明正大的手法，搞了一笔交易。”

“说下去。”

“法国人首先拉拢德国人，让德国人相信由共同市场接管世界货币制度的时候已经来到。他们两国串通一气，胁迫基金会的其他成员国支持这个计划。我们东方的伟大朋友日本人闻风而动，立刻参加了俱乐部。”

“他们有什么计划？”

“他们将联合起来把本国的货币直接与黄金挂钩。当然要提高价格。而且他们的货币都可以自由地兑换成黄金。现在你明白它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美元变成卫星货币。”

“对。和波兰的兹罗提几乎属于同一类型。”

“这些狗杂种。”

“我已经跟你说过多年了。”

“好吧，”总统回答说，有些恼火。“不过首先请告诉我，这些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安插在德国财政部的人。他们请他帮助起草一个协定。已经在我这里。你要知道，协定都已经草签了。”

克罗斯比伸手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叠复印的文件。

“这些文件的真实性，是绝对不容怀疑的。”

“亨利，好吧。”总统草草地看了一下这些文件以后说。“我相信你。他们定在什么时候行动？”

“一月二日，他们在巴黎共同宣布。他们计划第二天马上实行。”

“但是，难道他们没有想到会在世界上受到批评吗？他们

一定得知道我们是会听到风声的，是不是？”

“他们也许知道。但是他们认为，而且肯定认为，他们已经把我们逼入困境。”

“但是我们是进入困境了吗？我可不敢说，”总统说。

“你说什么呀？你和我都知道——”

“我知道这点：我不准备让美元成为全世界的笑柄。我不准备让欧洲和日本接管国际货币制度，牺牲我们的利益。天知道他们下一步还想接管什么。”

“但是怎么做？”

“很简单。我们来个先发制人。我们把黄金的官方价格提高到一百二十五美元一盎司，同时全部恢复美元和黄金之间的可兑性。而且就在一月二日之前。”

“但是，”克罗斯比争辩说，“如果大家都抢购黄金，我们怎么办？现在外头有七百五十亿美元，都有可能兑换成黄金。我几乎不用提醒你，我们目前的黄金储备——”

“请注意，亨利，”总统接着说，“一九三四年罗斯福把金价从二十点六七美元提高到三十五美元一盎司时，他的处境也是一样。但是他认为新的黄金价格会吸引更多的卖主，而不是更多的买主。后来实际上就是这样。在美元上可以获取利息，好利息。而在黄金上得不到利息。”

克罗斯比说：“是的。不过问题是那些投机商。”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总统回答说。“你瞧，自从罗斯福上次大幅度地提高金价以来，已经四十年了。你可以完全肯定，当我宣布的时候，我就会让全世界知道，我不期待在二〇〇〇年以前还有必要再作变动。”

“总统先生，”亨利·克罗斯比说，“你抓得对！他妈的！你抓得真对。大家都以为你对经济一窍不通。老兄，我就想看看那些法国人听到以后是什么脸色！”

“嗯，你可以放心，一直到我在电视上宣布以前，他们不会听到。亨利，这件事必须完全、绝对地保守秘密，一直到最后一

分钟。”

“我知道。既然搞出全部细节还需一定时间，保密可能还是个问题。总统先生，事实上，我看你一边准备好细节，一边还应该再走一步。把黄金价格提高到一百二十五美元一盎司，对。但是美元跟其他货币兑换时也把美元贬值百分之十五。那些家伙老是吵吵嚷嚷，说美元估价过高，国际收支总是有赤字，要我们多收回一些美元。哼！如果再贬值那么多，我们就又能和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竞争并击败他们。甚至日本人。一不做，二不休。他妈的，这在选民中会留下很深的印象。你在恢复美国对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保护美国人的职业，把美国拉回到繁荣的道路上，使美元恢复到不仅作为美国的货币，而且作为整个世界货币的合法地位！”

“亨利，”总统冷淡地说，“让我们别得意忘形。不过，你说得对。一不做，二不休。现在你看我们需要多少时间？”

两人对这个问题继续讨论了两个小时，最后决定行动日定在十一月八日，星期六。公告在十一月七日傍晚银行关门后发表。

隔了几个星期，计划按时形成文字，仅仅复印了五份，每份均用红色封面装订，表示绝密。白宫的这两个人，加上国务卿和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以后，又决定请第五个人参加执行这个计划。他是国际清算银行总干事。读者可能对这家银行不甚了解。但是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外，它毫无疑问是国际货币系统整个复杂的组织结构中最为重要的金融机构了。事实上它起了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中央银行的作用。

例如，当英镑或意大利里拉不时地受到压力的时候，正是国际清算银行——在金融界里称为BIS<sup>①</sup>——出面进行大规模的干涉，以防止事态扩大。当大家都在出售的时候，国际清

---

① BIS，国际清算银行的英文缩写。

算银行就收买，反之亦然。为此目的，它可以从所有人手里得到几乎无限的资金。因为它的所有人就是世界上的主要中央银行，诸如英格兰银行、瑞士国家银行、匈牙利国家银行。从华盛顿的立场来看，最为重要的是自从一九七一年以来，每当发生金融危机，国际清算银行总是对美元提供主要的、一贯的支持。它是敌人领土内的朋友。

在四十多年来第一次大幅度地提高金价以后，国际清算银行，特别是它的总干事的合作，对于恢复国际秩序是绝对必要的。这种事件可能掀起一阵震动地球上所有金融市场的浪潮。

根据决定，美国财政部长亨利·克罗斯比应该秘密会见国际清算银行总干事博林格，向他通报。要小心谨慎。如果克罗斯比在国际清算银行所在地巴塞尔突然出现，也许会引起臆测。大家一致认为，伦敦比较适宜。

一次很简短的越洋电话把日期定下了。十月十六日，下午四时，在萨沃伊饭店。

# 2

就在十月十六日同一天，沃尔特·霍弗博士从苏黎世坐瑞士航空公司的 168 航班抵达伦敦。时间是晚上刚过七点不久。他下飞机后，迅速穿过长走廊，想赶在其他乘客前头到移民站办入境手续。由于霍弗博士生来长着两条少见的短腿，要做到这一点，对他说来并不那么容易。这一点，也许是上帝有意安排的，因此，他决不会宽恕上帝。

至于霍弗博士的其他各个方面，那是十全十美的。无可挑剔的衣服，一头银发，一双指甲修得匀整的手，一张显得聪明、有教养、学识渊博的脸。他的举止显然把他和同时踏上英国国土的成千名其他旅客隔开了十万八千里。

霍弗对于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一清二楚。他作为瑞士第二大银行的董事长的地位，要求这一点。他把自己的职务不仅看作是一份工作，而且更主要的是一种职业。他的作用早已由权力给他命中安排好了，权力决定赐与一只格外仁慈的手来管理他的国家的人民，尤其是货币。

讨厌的移民官熟练地向他投出了一道轻蔑的目光，不过，当他看到霍弗护照上注明的职业时，又显出一种看来象是有点尊敬的样子。

“先生，是公事吗？”这是这一个月内第二次叫人“先生”，这种特权只保留在十分特殊的场合使用的。